

从七普数据看我国区域格局变化特征及趋势

王利伟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要:区域格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焦点和难点,随着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变动的一致性增强,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简称“七普数据”)研究我国区域格局变动特征和趋势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我国人口格局变化呈现出转折性变化新特征,受市场化机制、交通信息通达度、科技创新活力、地理空间距离和政府公共产品等因素影响,未来区域格局变动将呈现局部极化和总体协调、收缩型区域增多和扩张型区域减少、乡—城流动放缓和城—城流动增强、区域重大战略内部联系紧密与区域重大战略之间融合发展等趋势。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区域格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七普数据;人口格局;区域格局;影响机制;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12-0113-10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regional pattern chang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WANG Liwei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Macro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pattern is the keynot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regional pattern changes in China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Sev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China's population pattern have shown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pattern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marketization mechanism,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vitality, geographical spatial distance, and government public goods. The regional pattern in China has shown four major trends, such as local polarization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an increase in shrinking regions and a decrease in expanding regions, a slowdown in rural-urban mobility and an increase in urban-urban mobility, close internal connections within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major regional strategi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pattern.

Key words: the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population pattern; regional pattern; influencing mechanism; changing trends

收稿日期:2023-04-06 修回日期:2023-10-07

作者简介:王利伟(1984—),男,山东莘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战略规划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发展战略与规划、区域经济。

区域格局历来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焦点和难点。由于区域格局是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多重因素在空间上的综合映射,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开放和动态的复杂系统^[1],受多个因素的叠加影响而呈现精准预测难和优化调整难等问题。新时期我国区域格局正发生历史性转折性新变化,准确把握区域格局变化新特征新趋势是实施区域格局优化调整的前提和基础,深刻分析影响区域格局变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机制,对于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区域格局研究主要围绕区域布局展开^[2-4],但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5],人口格局变化对于区域格局变动将发挥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从经济理论看,劳动、土地、资本被称为传统生产三要素,人口是劳动的直接提供者、土地的使用者和资本配置的风向标,特别是伴随要素市场化深入推进,人口迁移和流动更加顺畅,人口净流入地区经济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而人口净流出地区则通常面临发展难题,人口格局变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区域格局变化,人口格局变化与区域布局变化的内在一致性越来越强,以人口格局变化及迁移流动为切入点研究新时期区域格局变化切实可行。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是历史上数据质量最高的人口普查数据^[6]。然而当前七普数据大多应用于人口学研究,直接应用于区域格局的研究仍然较少。本文致力于通过七普数据与六普数据的对比分析,研究我国人口格局变动特征和趋势,深刻剖析影响区域格局变动的基础逻辑,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高质量区域布局的对策建议。

一、从七普数据看我国人口格局变化的基本特征

我国已经迈入高流动性人口社会^[7],人口流动规模、流动方向、人口结构和区域布局变化将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区域格局的变化。2010 年、2020 年我国分别开展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

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通过与六普数据对比分析,七普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格局变化呈现“四大特征”。

(一)从人口总量看,人口迁移格局正经历“从西向东”迁移为主向“从北向南”迁移为主的新转变,“胡焕庸线”保持稳定

从四大区域板块人口总量变化看(见表 1),东部地区仍然是人口净流入地区,西部地区出现人口回流态势,中部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幅度缩窄,东北地区人口加速外流。东部地区是人口持续净流入的地区,2000—2010 年人口占比提高了 2.38%,2010—2020 年人口占比提高了 2.01%。西部地区人口呈现回流态势,人口占比呈现小幅增长特征,2000—2010 年人口比重下降了 1.09%,2010—2020 年人口占比提升了 0.12%。中部地区人口占比下降幅度缩小,2000—2010 年人口占比下降 1.07%,2010—2020 年人口占比下降缩小至 0.90%。东北地区人口流出持续加速,2000—2010 年人口占比下降 0.22%,2010—2020 年人口占比下降大幅扩大至 1.23%。

表 1 2000—2020 年我国四大区域在全国人口布局中的变化 单位:%

区域划分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2000—2010 年	2010—2020 年
东部	35.60	37.98	39.99	2.38	2.01
中部	27.84	26.77	25.87	-1.07	-0.90
西部	28.13	27.04	27.16	-1.09	0.12
东北	8.44	8.22	6.99	-0.22	-1.23

从南北方人口总量变化看,人口从南北相对平衡转向“从北向南”迁移转变。2000—2010 年北方地区人口占比提高了 0.15%,南方地区人口占比下降 0.15%,人口南北占比相对平衡,变化不大。2010—2020 年北方地区人口占比下降了 1.45%,而南方地区人口占比上升了 1.45%,人口呈现出明显的“自北向南”迁移的特征。

表 2 2000—2020 年我国南北方地区在全国人口布局中的变化 单位:%

区域划分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2000—2010 年	2010—2020 年
南方	57.84	57.70	59.15	-0.15	1.45
北方	42.16	42.30	40.85	0.15	-1.45

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总量变化情况看,两侧地区人口占比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2000—2010

年胡焕庸线东侧地区占比下降了 0.11%,西侧地区上升了 0.11%。2010—2020 年胡焕庸线东侧地区占比上升了 0.03%,西侧地区下降了 0.03%,总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

表 3 2000—2020 年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在全国人口布局中的变化 单位:%

区域划分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2000—2010 年	2010—2020 年
东侧	93.58	93.47	93.50	-0.11	0.03
西侧	6.42	6.53	6.50	0.11	-0.03

(二)从年龄结构看,省际人口流入少的省份“年轻化”特征明显,上海以北沿海地区“老龄化”加快,东北地区、沪苏地区和川渝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高

从 0~14 岁的年轻人口分布看(见图 1),省际人口流入较少的省份“年轻化”特征比较明显。0~

14 岁人口占比超过 20% 的省份主要包括西藏、贵州、广西、河南、新疆、江西、青海、宁夏、河北 9 个省份,除河北、新疆外,基本都属于省际人口净流入后排的省份,这些省份劳动年龄人口流出明显,出生率普遍较高,导致人口结构的“年轻化”程度较高。

从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布看(见图 1),上海以北的沿海地区劳动年龄人口下滑速度超过全国。其中:天津、河北、山东等环渤海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速度最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迁出加快并且当地老龄化进程也呈现加快态势的“双重”原因。从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情况看,东北三省、沪苏地区和川渝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均超过 15.5% 以上,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4%),老龄化趋势未来将会呈现加速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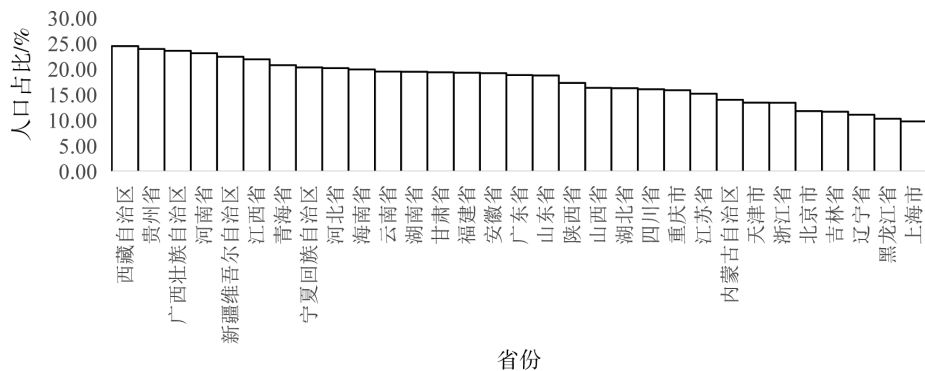


图1 2020年各省区0~14岁人口占比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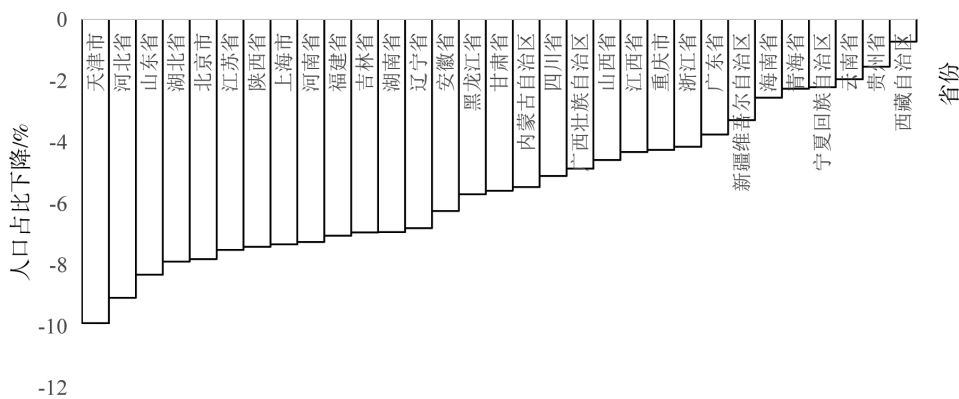


图2 七普与六普相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情况

(三)从教育结构看,高素质教育人口从中部地区占比较高向直辖市和东南沿海地区较高转变,主要流向东部直辖市和广东省

从教育结构看,六普时期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在

我国中部地区各省占比普遍较高,西部地区除了新疆、陕西外,其余地区平均占比较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两省占比最低,分别为 15% 和 17%,原因是两省均为人口流入大省,以低端加工为主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较多低学历劳动力,降低了高学历人口权重。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各省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高占比布局显示出“由西向东”移动的基本趋势,西南地区如西藏、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均在 12% 左右,而东部沿海省份由于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对经济驱动作用更加明显,高素质教育人口占比相比六普时期出现明显提高现象。从六普到七普大专人数流向看,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占比上升,其他省份均下降,高素质人口流向“极化”态势明显。

(四)从流动人口看,省内人口流动高度活跃,省际人口流入地主要是华南和华东地区,中西部地区吸引力上升

从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向看,2020 年全国流动人口 37 582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 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 25 098 万人,净增加 11 582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了 85.7%,占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 66.78%,呈现出比省际人口流动更加活跃的态势。从省际人口流入地分布来看,广东、浙江、上海、江苏为主的华南和华东地区吸纳了 8 089 万省际人口流入,占比高达 64.80%。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吸纳省际人口流入分别为 955 万人和 1 880 万人,分别比 2010 年上升 3.0% 和 5.5%,尤其是

新疆、四川、湖北、重庆吸纳省际人口规模都超过 120 万人以上。

二、从七普数据看我国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耦合变化特征

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高度关联且相互影响^[8],人口格局是经济格局和地区承载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格局的变动特征能够反映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而经济格局是人口格局、产业格局、交通格局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格局的变动特征也能够折射出人口格局变动趋势。从七普数据看,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变化的一致性呈现显著增强趋势。

(一)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正向耦合的一致性呈现增强趋势

从 2000—2010 年和 2010—2020 年两个 10 年跨度的人口格局和经济格局变动情况来看(见图 3、图 4),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同向变动的一致性呈现增长趋势。2000—2010 年全国 31 个省区(除港澳台)人口占比和经济占比都提升的省份有 8 个、都下降的省份有 7 个,人口比重上升但经济比重下降的省份有 9 个,人口比重下降但经济比重上升的省份有 7 个。总体来看,人口占比和经济占比同向变动的省份有 15 个,反向变动的有 16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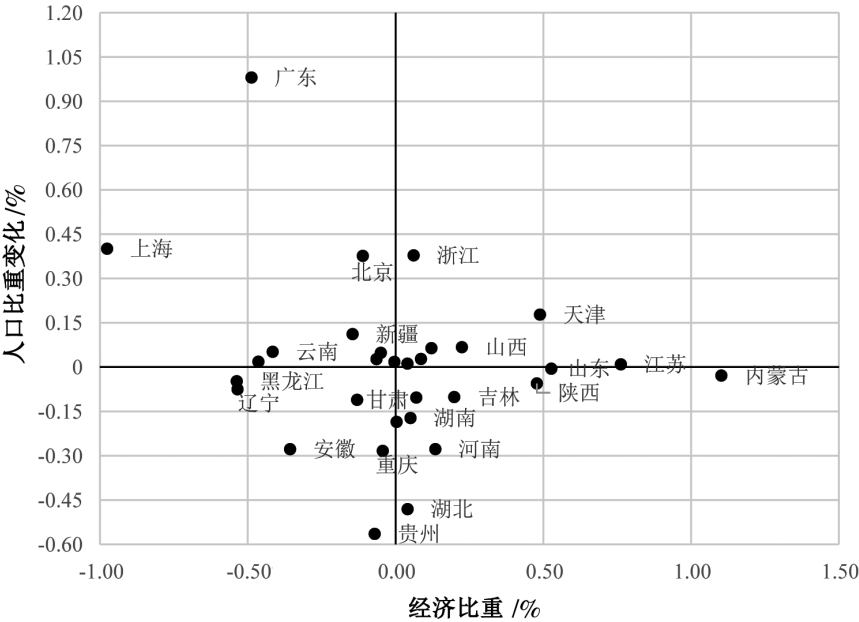


图 3 2000—2010 年间我国各省区人口和经济比重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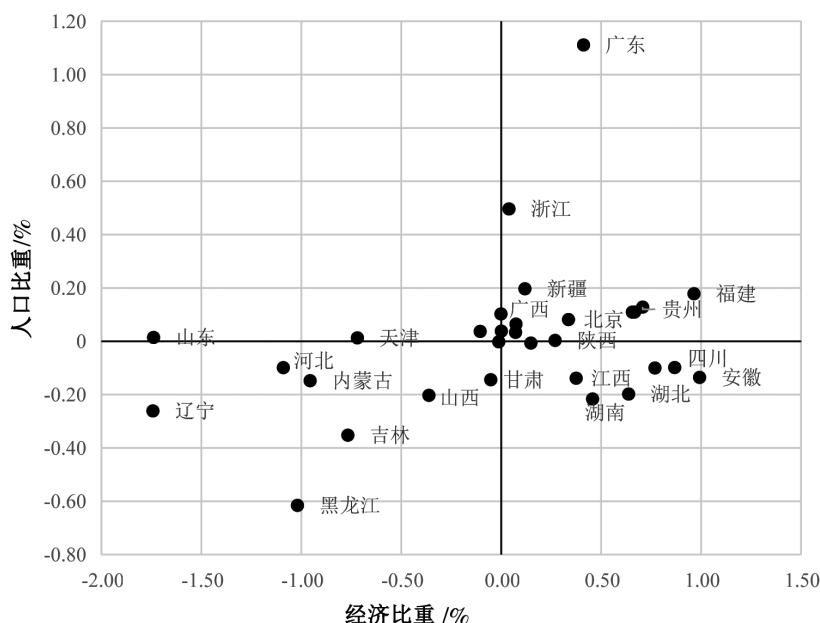


图4 2010—2020年间我国各省区人口和经济比重变化

2010—2020年全国31个省区人口占比和经济占比都上升的省份有15个、都下降的省份有7个,人口比重上升但经济比重下降的省份有3个,人口比重下降但经济比重上升的省份有6个。总体来看,人口占比和经济占比同向变动的省份有22个,比2000—2010年多7个,说明人口占比和经济占比一致性变化趋势明显增强,人口布局与经济布局的协调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利用人口格局分析区域格局的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二)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反向变动需要分类辨别区域发展态势

从全国31个省区的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变动情况看,有部分省区的二者变动方向并不一致,虽然这类省区数量呈现减少趋势,但仍需分类辨别这类地区二者反向变动的内在机理,准确把握这类区域发展态势。从2010—2020年来看,人口占比上升但经济比重下降的省份只有山东、上海和天津,3个省份人口占比均呈现微幅上升,上海经济占比微幅下降,山东、天津经济占比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1.74%、0.72%,主要原因是新旧动能转换不畅,加上受经济“挤水分”等因素影响,导致其经济占比下滑幅度过快。人口占比下降但经济比重上升的省份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四川和云南,主要是中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和西部发

展势头较好省份,这些省份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产业发展基础根基好、势头好,承接产业转移较多,导致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口大多呈现净流出状态,导致总体出现虽然人口占比下降但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由此可以判断,人口格局和经济格局反向变动需要分类辨别,人口占比上升但经济占比下降的区域需要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阶段性矛盾和问题,人口占比下降但经济占比上升的区域则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三)人口比重与经济比重双双下降的区域成为潜在风险较大的区域

人口比重和经济比重双双下降区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区域。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两个时间段的这类区域都是7个,两个时间段都包括辽宁、黑龙江和甘肃3个省份。2000—2010年还包括安徽、重庆、贵州、云南4省,在经过2010—202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4省经济比重均呈现止跌回升趋势,成功逃离了“风险区域”,而山西、内蒙古、吉林、河北4省份在2010—2020年之间受能源资源价格和产业政策调整影响,传统产业占比过高的经济结构转型进展缓慢,经济增速加快下滑,人口出现净流失的问题,经济比重和人口比重均呈现“双下降”态势,从而滑入“风险区

域”。从历史上看,“风险区域”极易陷入经济下滑导致人口流失、人口流失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的恶性循环,因此,这类区域成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类型。

三、从七普数据看我国区域格局变动的影响机制

在梳理以往文献的基础上^[9-11],利用七普数据,以省际人口流动为研究对象,以省际之间流动人口规模为因变量,以综合实力、创新能力、民生福祉、环境支撑、开放程度 5 个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为自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和综合回归模型,探索影响我国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见表 4),以人均 GDP 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是影响流动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创新能力、收入水平和开放程度都对流动人口具有重要吸引和促进作用,而失业率、地理空间距离则是限制和阻碍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

表 4 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2)	(3)	(4)	(5)	(6)
综合实力	人均 GDP	1.195 ***	—	—	—	—	1.284 ***
	城镇化率	0.038	—	—	—	—	—
创新能力	R&D 投入强度	—	0.486 ***	—	—	—	0.141 ***
	高技术产业产值	—	0.096 ***	—	—	—	—
	泰尔指数	—	—	0.193 ***	—	—	0.229 ***
民生福祉	失业率	—	—	-0.160 ***	—	—	-0.124 ***
	住房保障支出占比	—	—	0.213 *	—	—	—
	环保投资占比	—	—	—	0.220 **	—	—
环境支撑	人均公园面积	—	—	—	0.243 ***	—	—
	省际地理距离	—	—	—	-1.433 ***	—	-1.311 ***
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	—	—	—	—	0.068 ***	—
	铁路营运里程	—	—	—	—	0.470 ***	0.207 **
常数项		7.957 ***	7.957 ***	8.289 ***	18.080 ***	7.957 ***	17.471 ***
样本量		930	930	930	930	930	930
R ²		0.138	0.032	0.076	0.283	0.118	0.479

注:***、**、* 分别表示在 $p < 0.01$ 、 $p < 0.05$ 、 $p < 0.10$ 上有统计学意义;括号内数值为由稳健标准误。所有的指标均表示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相对比值。

(一) 市场化机制是促进人口流动并导致区域格局变动的“主动力”

以“推—拉”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原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原因。从七普数据建立的流动人口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看,人均 GDP、泰尔系数对人口流动起到重要正反馈作用,影响力系数分别为 1.284 和 0.229,分列影响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前 2 位,表明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

的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吸引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而失业率对人口流动起到重要负反馈作用,影响力系数为 -0.124,表明失业率高、就业机会少的地区会阻碍流动人口迁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劳动力资源要素按照市场化机制配置的趋势越来越强,市场化机制成为促进人口流动的“主动力”。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一轮市场化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同地区新旧动能转换进展不一、市场化发育水平也不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地区经济分化现象,经济发展活跃、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市场化转型相对顺畅地区会持续吸引人口流入,而市场化转型不畅、市场经济发育水平不高、就业机会少的东北地区和资源转型迟缓地区可能面临人口持续流出的困境,并由此造成我国区域格局随之不断发生变动。

(二) 交通和信息通达度提升是加速人口流动并重塑区域格局的“催化剂”

交通和信息通达程度会影响人口流动意愿、规模和方向,2010—2020 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的大幅改善,大大压缩了人口流动的时空距离,造就了一个“流动的中国”。从七普数据建立的流动人口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看,铁路运营里程指标对人口流动起到重要正反馈作用,影响力系数达到 0.207,排名正反馈机制第 3 位,表明交通条件改善会促进人口流动。毫无疑问,我国交通和信息通达程度将不断提升,立体化交通网络将加快成型,数字中国加快建设,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群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城市群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将进一步强化,影响人口流动的时空距离将进一步压缩,人口流动速度会加快、规模会进一步提升,引导人口向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流动,并会进一步强化区域集聚态势。

(三) 科技创新活力是吸引人口流入并在区域格局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风向标”

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活力强的地区一般是经济发展水平高、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服务环境好的地区,这类地区对高素质人才群体吸引力大,并需要

庞大的服务人口支撑,往往在区域发展中承担核心城市职能。从七普数据建立的流动人口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看,R&D投入强度对人口流动具有较强的正反馈作用,影响系数达到0.141,表明科技创新活力强的地区对吸引人口流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活力对一个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也是当前很多地区和城市注重打造吸引人才综合环境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城市群核心城市在区域分工中承担核心作用的“风向标”。

(四)地理空间距离是阻碍人口流动并影响区域格局变动的“制动器”

地理空间距离一直是阻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虽然交通和信息通达水平的快速提升大大减少了地理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的阻碍,但不可否认,地理空间距离对于人口流动具有阻碍作用。从七普数据建立的流动人口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看,地理空间距离对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负反馈作用,影响系数是-1.311,表明地理空间距离是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大因素。从省际迁移看,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人口流入大省,也是以邻近省份流入占比最高。比如,广东外来人口主要以邻近的广西、湖南为主,浙江、江苏、上海外来人口以邻近的安徽最多。从省内迁移看,七普数据显示省内近距离迁移规模和增幅远远大于省际远距离迁移,尤其是县城已经成为人口近距离流入的重要载体。

(五)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影响人口流动并促进区域格局变动的“调节阀”

虽然在七普数据人口流动的回归模型中没有设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变量,但不可否认,这对于人口流动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规划,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区域格局优化,国家连续实施了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重大区域战略,有效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原有四大区域战略的基础上,谋划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

化、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规划,通过建立稳定的政策实施机制和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进程,毫无疑问,这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规划必将对区域格局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二是政策制度因素,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政府政策对于人口流动意愿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吸引、也可以阻碍人口流动。比如,北京、上海通过制定实施严格的人口落户政策,使得常住人口实现由增到减的历史性转变,建成区面积呈现“减量发展态势”,而其他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深化,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从而加速了人口流动并影响区域格局变动。三是公共服务水平,我国人口迁移与以往逐渐出现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往主要是以劳动力为人口迁移主体,当前及未来迁移更多呈现以劳动力带动家庭迁移为主体^[12],人口迁移的关注点不再是单纯的收入差距,还要考虑家庭对迁入地的公共服务需求,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力水平以及是否对流动人口开放设施共享等都将影响人口流动,并进一步影响区域发展的后劲和发展格局。

四、从七普数据看我国区域格局变动的主要趋势

根据七普数据反映的人口格局变化特征,结合利用七普数据模拟的区域格局影响机制,综合判断,我国区域格局变动将呈现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变化趋势,准确把握这些变化趋势是优化我国区域格局的前提和基础。

(一)“区域局部极化”和“区域总体协调”的基本趋势更加明显

从七普数据看,我国流动人口向重点城市群和核心城市流动的趋势十分突出,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中原等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的热点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180万人,成渝、中原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65万人。从城市来看,深圳、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人口流入明显,流动人口增幅分别达到51.29%、73.1%、102.41%^[7]。除此之外,省会城市成为人口

流入的热点地区,大部分省会城市人口增幅达到 10%~25%,成都、西安、长春、西宁等人口全省占比超过 40%,武汉全省占比也达到 30%。可以预测,未来随着我国城市群和都市圈战略实施,市场化机制将更加加强和人口流向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区域局部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13]。

从人均 GDP 指数变化情况来看(见表 5),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指数分别为 1.47、1.40 和 1.30,中部地区人均 GDP 指数分别为 0.73、0.74 和 0.86,西部地区人均 GDP 指数分别为 0.61、0.69、0.78,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 GDP 指数均呈现向 1 靠近的趋势,呈现出更加协调的发展趋势。但东北地区人均 GDP 指数却呈现出快速下滑并远离 1 均衡线的趋势。南北方之间的人均 GDP 指数也是呈现反转型变化,从相对均衡转向南方明显高于北方^[8]。但从总体趋势来看,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政府在区域协调中将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区域总体协调水平将不断提升,南北区域差距有望得到有效控制。

表 5 2000—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指数比较变化

区域划分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东部	1.47	1.40	1.30
中部	0.73	0.74	0.86
西部	0.61	0.69	0.78
东北	1.19	1.04	0.72
南方	1.01	0.99	1.09
北方	0.98	1.01	0.87

注:表中数值为人均 GDP 指数比较值,即某一区域 GDP 占全国的比重与人口占全国比重的比值。

(二)“收缩型区域”增多与“扩张型区域”减少的趋势更加明显

从七普数据看,我国人口增长区域在减少、减少区域在增多。从省级层面看,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只有 4 个人口减少的省份,主要是中西部省份,分别是贵州、重庆、四川、湖北,分别减少 49 万人、166 万人、193 万人、227 万人。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减少省份扩大到 6 个,主要是东北和西北的省份,分别是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减少 55 万人、65 万人、79 万人、115 万人、338 万人、646 万人。从地市层面看,六普数据和七

普数据显示,人口总量增加的地级市从 236 个下降到 183 个,而人口总量减少的地级市从 91 个增加到 134 个。以陕西省为例,七普数据显示,只有西安、榆林、延安人口呈现正增长,分别增长 52.97%、8.16%、4.37%,其他地市人口全部呈现负增长态势。安徽省同样出现类似情况,合肥及北部邻近城市呈现正增长,其他更多地市呈现负增长态势。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和人口流动规模的增长,人口会持续向经济发达、科技创新活力强和公共服务条件好的地区集聚,无论省级层面还是地市级层面,我国“收缩型区域”增多和“扩张型区域”减少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三)“乡—城流动”放缓与“城—城流动”增强的趋势更加明显

从七普数据看,在我国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人口占比 66.26%,比六普期间上升了 3.06 个百分点,而“城—城流动”占比 33.74%，“乡—城流动”是流动人口增加的主体^[14],这与 2010 年—2020 年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是紧密相关的,这期间城镇化率提升了 14.2 个百分点,年均增长 1.42 个百分点,由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转移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体。2022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65.22%,从发展阶段上已经步入城镇化中后期的缓慢发展阶段,预计到 2035 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将降低至 0.5~0.8 个百分点。因此,从未来人口流动格局来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放缓,我国“乡—城流动”速度将随着呈现放缓态势,而已经进城人口的“城—城流动”规模将持续扩大,并呈现持续增强的态势。

(四)区域重大战略内部联系紧密与区域重大战略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从七普数据看,区域重大战略范围内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频繁,联系更为紧密。以京津冀为例,虽然北京市大力实施非首都功能疏解工程,限制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但北京人口仍然实现 11.63% 的增长,且 15~59 岁年龄段人口比重高达 74.86%,远高于河北省的 65.85%,其中不少人口来自邻近的河北省,而北京市中心城区疏解人口主要向远郊区和环京地区^[15]。以与通州区毗邻的廊坊北三县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往返北京的

通勤人口达到 20 万人次左右。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内部区域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其中沪苏、广佛、东莞等地区甚至达到同城化水平。由于区域重大战略在国家层面有常态化推进的实施机制,区域内部联系的政府纽带作用强,随着轨道上的京津冀、轨道上的大湾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未来区域重大战略内部城市之间联系将呈现更加紧密的趋势。另外,在区域重大战略内部“条块状”复合型区域综合体加快形成的背景下,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融合发展需求愈发迫切,并着力从国家层面探索推进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之间的融合发展举措。可以预测,未来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融合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抓手,有望迎来更大突破。

五、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七普数据分析我国人口格局的变动特征,构建了基于人口数据变化的影响因素测度模型,剖析了影响区域格局变动的基础逻辑,刻画了区域格局的变动趋势,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如下。

(一) 主要结论

(1) 从人口格局变化特征看,人口迁移格局正经历“从西向东”迁移为主向“从北向南”迁移为主转变,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重保持稳定;省际人口流入少的省份“年轻化”明显,东北、沪苏、川渝地区老龄化程度高;高素质教育人口流向直辖市和东南沿海地区趋势明显;省内人口流动高度活跃,省际人口主要流入华南和华东地区,中西部地区回流明显。

(2) 从人口格局与经济格局耦合看,二者格局变动的一致性显著提高,东北三省、山西、内蒙古、河北、甘肃等人口和经济比重双双下降的北部省份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区域,二者反向变动的区域需要分类辨别区域发展态势,从人口格局分析区域格局切实可行。

(3) 从区域格局变动影响机制看,市场机制是促进区域格局变动的“主动力”,交通和信息通达程度是重塑区域格局的“催化剂”,科技创新活力是促进区域格局变动的“风向标”,地理空间距离是影响区域格局变动的“制动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促进区域格局变动的“调节阀”。

(4) 从区域格局变动趋势看,“区域局部极化”和“区域总体协调”的基本趋势更加明显,“收缩型区域”增多与“扩张型区域”减少的趋势更加明显,“乡—城流动”放缓与“城—城流动”增强的趋势更加明显,区域重大战略内部联系紧密与区域重大战略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二) 对策建议

(1) 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小集中、大分散、总体协调”的高质量发展区域格局。根据七普数据反映的人口流动格局和演化态势,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高质量发展需求出发,构建“小集中、大分散、总体协调”的总体区域格局。一方面,采取分类引导的措施,“抓两头、放中间”,重点增强都市圈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县城这“两头”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水平,因势制宜培育“中间”城市,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和县城集中集聚,在全国层面推动形成局部“小集中”高效布局形态。另一方面,积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重点推动四大板块和南北方之间在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等方面持续缩小差距,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16],在全国层面推动形成“大分散、总体协调”区域格局。

(2) 顺应人口迁移流动的客观趋势,构建与人口需求相适应的要素和公共服务配置格局。遵循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趋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要素和公共服务跟着人口走”的资源配置新理念,加强人口流入地的要素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增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能力。一是探索建立“钱随人走”、“地随人走”等要素保障机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变化挂钩、建设用地指标与常住人口变化挂钩的机制,充分保障人口流动的要素需求。二是加强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保障,根据人口流入规模和需求测算^[17],适度超前配置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资源,提升流入人口在地融入能力。三是建立健全有利于人口自由高效流动的政策环境,全面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坚决破除限制落户的“显性壁垒”和“隐性障碍”，建立人口跨地区流动的社会服务衔接机制。

(3) 强化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协作, 构建协同推进“异地城镇化”的高效机制。立足于提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 强化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协作, 比如, 加强东北地区与东南地区协作、发达省份与邻近省份协作、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之间协作, 聚焦人口社会服务衔接、产业市场化协作、要素跨区域交易等领域建立紧密协作关系, 构建协同推进“异地城镇化”的高效机制, 全面提升协作水平, 既能起到辐射带动人口流出地区的作用, 又能协同增强流动人口“异地城镇化”的动力。一是促进人口社会服务衔接, 围绕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社保接续、职称评定等建立对接机制。二是强化产业协作机制, 引导符合条件的人口流入地外溢产业有序向人口流出地转移, 鼓励人口流入地建立来自人口流出地的优质产品市场平台。三是探索土地要素跨区域交易机制, 鼓励人口流出地加强建设用地盘整, 富余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交易至人口流入地地区。四是建立人才挂职交流机制, 鼓励相互之间建立政府公职人员、科技人才、教育人才、医疗人才的交流机制。

(4) 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构建高水平网络化的区域格局。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 建立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之间的协调机制, 强化国家层面战略统筹, 协同推进跨区域战略之间的重大廊道建设, 打造沿海、沿江、沿边和沿重大交通廊道的高水平网络化区域格局。一是强化规划衔接, 在区域重大战略规划纲要、实施意见、年度工作要点等规划文件中相互之间留有“接口”, 推动重大任务加强规划衔接。二是强化跨区域重大交通廊道建设, 比如长江经济带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在沿江复合型交通廊道建设、进出海集疏运大通道建设等方面要加强协作。三是强化跨区域生态保护的战略协作, 比如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战略在生态屏障联合打造、水源涵养等方面亟需加强协作。四是强化跨区域产业协作,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战略之间围绕着打造

开放型经济体系方面有很多协作空间。

参考文献:

- [1] 樊杰, 王亚飞, 梁博.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J].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437-2454.
- [2] 陈栋生.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与前瞻[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3): 21-28.
- [3] 王洋, 修春亮. 1990—2008 年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8): 1037-1046.
- [4] 贺三维, 王伟武, 曾晨, 等. 中国区域发展时空格局变化分析及其预测[J]. 地理科学, 2016, 36(11): 1622-1628.
- [5] 蔡昉. 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J]. 新金融, 2023(7): 4-10.
- [6] 翟振武, 刘雯莉. 七普数据质量与中国人口新“变化”[J]. 人口研究, 2021, 45(3): 46-56.
- [7] 陆杰华, 林嘉琪. 高流动性迁徙的区域性特征、主要挑战及其战略应对[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1(6): 4-14.
- [8] 吴瑞君. 从“五普”到“七普”: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时空耦合和区域均衡发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174-183.
- [9] 严善平.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1): 71-77.
- [10] 李拓, 李斌.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2): 73-83.
- [11] 古恒宇, 劳昕, 温锋华, 等. 2000—2020 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2, 77(12): 3041-3054.
- [12] 王利伟. 2030 年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对策建议[J]. 中国经贸导刊, 2017(9): 71-72.
- [13] 王利伟.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格局变动趋势及优化对策[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9): 66-72.
- [14] 陆杰华, 林嘉琪. 中国人口新国情的特征、影响及应对方略: 基于七普数据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3): 57-67.
- [15] 王利伟. 京津冀距离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有多远: 基于熵值模型方法[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9): 142-152.
- [16] 王智勇, 胡纯广, 严慧慧, 等. 我国市级人口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引导策略: 基于 317 个地级市“五普”、“六普”和“七普”人口数据[J]. 规划师, 2022, 38(5): 14-20.
- [17] 程梦瑶. 迈向高质量发展: 基于“七普”数据考察我国人口城镇化新阶段[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2): 93-103.

(本文责编: 润泽)